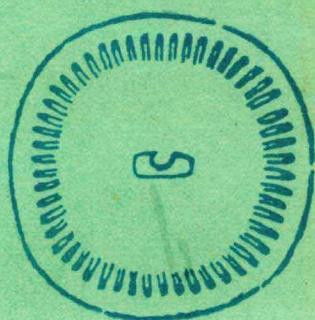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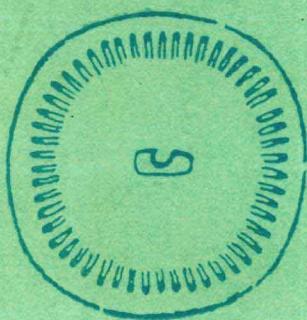


考 | 古 | 学

文 | 化 | 论 | 集

3

苏秉琦 主编



文 物 出 版 社

考古学文化论集

(三)

苏秉琦 主编

文 物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056号

本集执行主编 严文明
责任编辑 伍仁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考古学文化论集

(三)

苏秉琦 主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199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29.5 插页：4

ISBN 7-5010-0685-7/K·283 定价：25.00 元

目 次

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水 涛(1)
雁儿湾和西坡坬	严文明 张万仓(12)
半山、马厂文化研究	李伊萍(32)
关于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关系的讨论	陈 雍(68)
四坝文化研究	李水城(80)
辛店文化研究	张学正 水 涛 韩翀飞(122)
略论卡约文化	高东陆(153)
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	许永杰(166)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若干问题	滕铭予(204)
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地方类型	赵 辉(230)
岳石文化地方类型初探 ——从郝家庄岳石遗存的发现谈起	吴玉喜(270)
辽宁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	许玉林(311)

论窑洞

- 考古中所见西周及其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胡谦盈 张孝光(335)
论陶甑、陶甗的来源和分布……………[德国] 施米克(371)
商周时期的龙、龚铭铜器及相关问题……………曹淑琴 殷伟璋(395)
- 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任世龙(411)
北辛文化制陶工艺初探……………钟华南(419)
- 玛雅文化陶器年代学的初步研究……………蒋祖棣(429)
从美洲考古学看新考古学……………杨建华(453)

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水 涛

在我国近代考古学发生、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中，西北地区曾经是人们最早给予注意的地区，也是历年来工作开展较多、发现较多的地区。这里现已初步建立了地方性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发展序列。许多发现表明，这里是探索和解决一些史前研究中重大学术课题的关键地区，因此，这里的工作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注意。在我们对将来的工作作出预测和展望时，首先认真地回顾这一地区史前研究工作发展的历史，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及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探险队”、“考察队”相继到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进行活动。到20世纪初，这种活动达到高潮。这些探险队活动的范围很广，包括了我国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地区。活动的内容最初主要是从事地质、地理、生物学的考察，以后逐渐扩大，涉及历史、考古、民族、语言、民俗、宗教、艺术、中西交通以及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广大领域。这其中发现较多、后来影响较大的有斯文·赫定、斯坦因、安特生、波塔宁、科兹洛夫、伯希和、大谷光瑞、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的考察活动。对于史前人类活动发现较多的只有斯文·赫定、安特生等人。

斯文·赫定一生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7次探险考察活动，从1893年断断续续直到1935年。最重要的是1927年开始的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这个考察团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共任团长，中方参加者中包括了著名的地理学家袁复礼、考古学家黄文弼等人。考察团1927年5月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古西部到额济纳河流域，于1928年到达乌鲁木齐。其后又从1930年到1935年，走遍了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在这一综合考察活动中，首次在我国的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新疆东部等地区，发现了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著名的有新疆哈密七角井遗址等地点^①。这是在我国境内较早发现的史前遗存之一。

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首次发现了一种彩陶遗存之后，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论断。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假说，他有意识地对我国西北地区直到中亚腹地的古代交通通道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察活动。从1923年到1924年，在甘肃境内调查了大量的遗址

(约五十多处),收集了许多陶器、石器等遗物。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②,他首次将甘肃的古文化分为六期,即齐家期、仰韶期(半山)、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尽管受许多条件限制,使安特生当时误将齐家期素面陶器的年代排在半山期、马厂期彩陶的前面,但在二十年代的最初发现中,能基本准确地区分出这六种文化遗存(其中在寺洼期的陶器群中安特生已经注意到了卡约、下西河等地点的特殊性,卡约的遗存后来被确认为卡约文化),仍然是安特生的一大贡献。

20年代在西北地区的工作,还有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等人在甘肃陇东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陇东也是我国最早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地区。在此基础上,后来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又陆续有所发现,计有庆阳巨家塬^③、环县楼房子^④、环县刘家岔^⑤、镇原黑土梁^⑥等地点。

30~40年代,我国一些田野考古学家,也曾到西北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并有重要发现。影响较大的有夏鼐、裴文中、苏秉琦等人的工作。

1944年春,夏鼐参加了前中央研究院及前中央博物院所发起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事甘肃省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历时两年。先是由何乐夫陪同,在兰州附近考察了高坪、中山林、太平沟、十里店、土门后山、曹家咀、青岗岔等处遗址。这次调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①确定了兰州区域有史前遗址的存在。②确定了遗址的文化性质是属于齐家、甘肃仰韶、马厂三种文化,而辛店、寺洼、沙井三种文化,似乎未曾传播到兰州区域。”^⑦

1945年4月,夏鼐等人来到洮河流域进行考察,在寺洼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其目的是想确定马家窑期遗址和寺洼期墓葬的关系,同时,对寺洼期墓葬作较详细的观察和记录,通过发掘,夏鼐提出以下几点认识:①马家窑期遗存与河南的仰韶文化颇多不同,应以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种名称。②年代方面,可大体断定寺洼文化的年代晚于马家窑期彩陶文化,早于汉代。③寺洼文化与辛店文化可能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④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文化,后者不是从前者变化而来的,因此,不能以沙井的年代来推测寺洼文化的绝对年代。⑤寺洼文化与马家窑期遗存显然属两个文化系统,与齐家文化也不同。因此,其渊源问题尚无法解决。⑥由于寺洼文化中火葬制的发现,根据文献记载分析,其族属应是氐羌族系^⑧。

1945年5月,夏鼐等人在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进行试掘。在所发掘的2号墓填土中,发现了两片泥质红陶片,上有黑彩花纹,属标准的仰韶文化彩陶片。据此,夏鼐提出,这一发现从地层上证明了甘肃仰韶文化的年代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如果将安特生序列中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加以修改、互相倒转,就会使“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不会比公元前2000年早过许多”^⑨这一推论与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的矛盾迎刃而解^⑩。

夏鼐在甘肃的一系列工作和发现,比起安特生建立的序列体系,又前进了一大步。由

于夏鼐是一位出色的田野考古学家，更注意从田野发掘中获得证据，提出论断，这就使得他的发现令人信服。由于他的每次发掘目的都很明确，使他能在不太大的田野发掘中，提出和解决一系列的学术问题。他的许多论断，如马家窑文化的确立、齐家文化年代的改定、寺洼文化族属的推断等，在以后的大量工作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当时，这是我国考古学界的重要成就。夏鼐的工作由此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

裴文中的工作主要是在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他于1947年9月，在寺洼山遗址发掘了一座墓葬，“似曾经混乱者人骨之旁及下，均有排列之大砾石甚多，或与墓葬有关”^⑪。这是首次发现寺洼文化的积石葬俗。他在《甘肃史前考古报告》（油印本）中^⑫，对渭河流域的许多遗址的位置、地形及文化性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应当说这是第一本较有价值的渭河流域遗址调查报告。

苏秉琦1934年起就在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⑬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首次提出了先周文化、先秦文化的问题。他的《瓦鬲的研究》^⑭等论著，为考古发现中的类型学研究树立了典范，为西北地区其后对各种含有瓦鬲因素的文化遗存的区分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纵观1949年以前西北地区的史前研究工作，虽然一开始是由于外国探险队、考察队的纷纷涌人而发端，但接下来的，则是我国学者独立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和发现。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在当时国难深重，各种条件都不具备的困难境况下，依然能有上述的许多工作和成就，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些工作和成就，和仰韶村发掘、殷墟发掘、城子崖发掘、西阴村发掘一样，代表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端和最初的发展过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和中原地区的工作一起，走在了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的最前端。

1949年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一个田野考古工作的新阶段随之来到。在西北地区，首先面临的是为配合黄河水库工程而进行的一系列文物普查和抢救发掘工作，在黄河上游以及黄河流域许多重要的水系流域，如渭河、泾河、洮河、湟水等地均发现了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址，经过大面积科学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几十处。通过这些普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1957年在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⑮；1962年在武山石岭下遗址发现在马家窑类型遗存之下还有一文化层，即石岭下类型遗存^⑯；后来在天水罗家沟遗址又发现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遗存从下到上的三叠层^⑰；1960年永靖马家湾遗址发掘，发现了7座马厂类型的半地穴式房子，证实了马厂类型遗存不仅有墓地，而且也有自己的居住遗址^⑱；1956年秦安寺咀坪遗址发掘，发现了6座齐家文化的白灰面房子^⑲；1959年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发现了齐家文化的房子、窖穴、墓葬、石圆圈等大量遗迹和遗物^⑳；1959—

1960年永靖秦魏家遗址发掘，揭露了齐家文化一处保存完整的公共墓地^⑯；1957、1959年及以后对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齐家文化的男女合葬墓及铜器等重要现象^⑰；1964年宁夏固原海家湾遗址发掘，发现了不同于甘肃中部典型齐家文化遗存的另一类遗存^⑱。

在对于时代较晚的青铜文化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1958、1959年对永靖张家咀遗址、姬家川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揭示出辛店文化两种不同类型的遗存，后被称为张家咀类型、姬家川类型^⑲；1956年依据东乡唐汪川山神遗址所出的陶器，提出了“唐汪式陶器”的概念^⑳；1957年根据山丹四坝滩遗址发现的陶器，提出了四坝文化的概念^㉑；1958年根据平凉安国镇发现的一座残墓的资料，提出“安国式陶器”的概念^㉒；1959年在青海省都兰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诺木洪文化，其主要分布区域是在青海西部柴达木盆地一带^㉓。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1963年在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水洞沟文化^㉔，这一发现填补了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一个空白。

从上述的工作和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北史前考古研究，比起解放前有了根本的变化。包括调查和发掘在内的各种田野工作，已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特别是对一系列重要遗址的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使许多发现趋向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系统化、序列化。在甘肃中部，初步建立了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年代序列。基本摸清了黄河上游几种主要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各自的文化特征。这一成果标志了西北史前研究工作的水平，在当时的国内考古学界，仍然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

除了一系列的发掘工作，这一时期的综合研究工作也已初步展开，取得了一些令人可喜的成果。张学正的《甘肃古文化遗存》一文^㉕，利用大量的第一手普查资料，系统地论述了甘肃境内已发现的多种古文化遗存的分布、特征及相互关系等问题，代表了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认识水平。安志敏的《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㉖，对于纠正安特生分期的错误，清除这一错误的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革期间，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文革后期，自1972年以来，部分地恢复了调查、发掘工作：1973年在永昌鸳鸯池墓地发掘中发现了马厂类型墓葬(M44)打破半山类型墓葬(M72)的地层关系^㉗；1974年在永登蒋家坪遗址发掘中发现了马厂类型遗存压在马家窑类型遗存之上的地层关系^㉘；以后又根据一批¹⁴C测定年代数据^㉙，可以将马家窑文化诸类型的序列建立起来，即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1973年广河地巴坪墓地的发掘，发现了半山类型墓葬66座^㉚；1975年景泰张家台墓地发掘，首次发现了半山类型遗存的石棺葬(以石板数片围成棺状)^㉛；1974年开始直到1980年，多次对

青海柳湾墓地进行发掘，共发现半山、马厂、齐家等文化类型的墓葬 1700 多座，这是西北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史前公共墓地^⑦；1974 年兰州王保保城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了马家窑类型的墓葬^⑧；1977 年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发掘，发现了一批马家窑类型的瓮棺葬^⑨；1977 年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铜刀子一件^⑩；1975 年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⑪、1975 年广河齐家坪遗址发掘^⑫、1977 年贵南尕马台遗址发掘^⑬，都发现了齐家文化的铜器，器形有刀、锥、凿、钻头、匕、斧、镜、环饰等，经鉴定有的为铜铅合金的铅青铜；1976 年在玉门火烧沟墓地发掘的一批墓葬^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铜器以及部分小件金饰器等，这是甘肃目前发现早期铜器最多的一个地点，红铜、青铜均有。

“文革”后期开始进行的大量工作，直到 1978 年以后，才逐步走上正轨，并开始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从全国范围内来观察，这一时期科学的研究中探索、争鸣的气氛日益活跃，在考古学界首先是对考古类型学、地层学的重新肯定和强调，其后是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和运用。1973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重要发现^⑮，七十年代以来在辽河流域的一系列重要发现^⑯，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的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说进行深刻的反思。对史前文化的多源发生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种学术界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转变，对西北地区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应该提到的是 1978 年开始的连续 7 年的对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⑰，这项工作的成果是多方面的：①首次在渭河上游地区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②由于这一遗址的发掘，建立了甘肃东部自距今 7000 年到距今 5000 年前后的文化发展序列，这就是：大地湾一期遗存（也被称作大地湾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庙底沟类型遗存→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石岭下类型）→“常山下层”类型遗存。③通过大面积发掘，基本完整地揭示了大地湾遗址的全貌。这是黄河上游地区考古发现中，唯一一处规模较大、年代较早、延续时间长的史前聚落。④通过这一发掘工作，有目的地强调了地层学、类型学、区系类型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培训了专业研究人员的业务素质，改进了以往的田野工作方法和作风。⑤注意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攻关，对大地湾遗址的地理地貌特征、环境构成、动物骨骼、植物炭化子实、孢粉等方面进行了许多专题研究，对房屋的结构、地面材料的材料力学特性等进行了专门的鉴定和实验研究。由于这项工作还在继续，相信仍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对于大地湾遗址的全面揭露和综合研究，标志着地方考古研究机构的成熟，这是新时期西北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地方研究机构的迅速建立和完善，使得参加田野工作的业务人员的人数比“文革”以前有很大的增长，工作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在这一时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

在青海省，1973—1980 年对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的发掘，揭露了从马家窑文化直到汉代各时期的墓葬 1000 多座^⑯，其中包括 M384 所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盆等发现；1978 年民和核桃庄、山家头墓地的发掘^⑰，对辛店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循化阿哈

特拉山遗址^⑯、循化苏志村遗址^⑰、循化苏呼撒遗址^⑱、贵德山坪台遗址^⑲、湟源大华中庄遗址^⑳等地的发掘，积累了大量的卡约文化的墓葬材料。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区分卡约文化不同地方类型的观点^㉑。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70年代后期以来，也有了一系列的工作和发现：先后在孔雀河古墓沟^㉒、哈密五堡^㉓、哈密焉不拉克^㉔、吐鲁番艾丁湖^㉕、鄯善苏巴什^㉖、鄯善洋海^㉗、木垒四道沟^㉘、奇台半截沟^㉙、巴里坤兰州湾子^㉚、巴里坤奎苏南湾^㉛、乌鲁木齐乌拉泊^㉜、乌鲁木齐阿拉沟、鱼儿沟^㉝、东风厂^㉞、和硕新塔拉^㉟、和静察吾呼沟口^㉟、塔什库尔干香宝宝^㉟等地点的发掘工作，陆续揭示了一些含有彩陶因素的青铜文化遗存。部分遗存中发现的铁器表明，新疆彩陶因素存在的时间很长，有的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对于东疆地区彩陶因素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㉟，一些具有红衣黑彩作风的彩陶及一些素面红陶的造型特征，应是接受东来文化因素影响的产物，这类作风的彩陶有经天山阿拉沟等自然通道继续向西、向南传播的线索可寻。同时，在东疆及南疆的部分彩陶遗存中，还能区分出来自中亚地区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因素。这表明，新疆古代文化的构成因素是十分复杂的。这些发掘工作对于最终建立新疆东部、南部及北部各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对于这些遗存的年代、性质及其文化分期研究等问题，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1987年在北疆呼图壁县境内发现的大型岩刻人物画面^㉛，对于了解广泛分布于新疆各地的古代岩刻画的创作背景及创作者的族属、宗教活动、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1986年隆德页河子^㉜、海原菜园等遗址的发掘^㉟，揭示了清水河流域仰韶文化之后的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显示了与甘肃东部、中部地区的若干文化遗存的一致性特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方差异性，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课题。

各地的工作，在大量积累发掘材料的同时，对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任务。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史前文化所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面貌，往往表现为：同一地区时间上互为先后的文化遗存，很难确认其文化发展上的必然联系；同一区域内处于同一时间阶段上的各类文化遗存，很难明确判定互相的文化影响作用结果。某一典型文化的分布范围、存在时间，一般都局限于一个很小的时空界限内，文化遗存间的差异性往往大于相同的因素，这就使得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不断使用新的命名。这些变幻莫测的现象，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兴趣和注意力。而解决这些复杂的文化关系问题，必须从解决单一文化的发展序列入手。因此，对于一个个单一文化的专题研究的兴起，就成了这一时期西北史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在这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现为考古系）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些合作研究项目，提出和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课题：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合作在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㉟，区分出了A组、B组两类遗存，研究者认为，毛家坪A组遗存前段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东周秦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和资料。毛家坪 B 组遗存所具有的铲形袋足鬲等文化特征，不同于甘肃东部已知的各种文化遗存，当是一种新的发现，研究表明，这类遗存可能与活动于甘肃东部的戎人系统有密切的关系^⑦。1984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合作在庆阳合水九站遗址的发掘^⑧，发现了一类以单耳乳状袋足鬲等器形为主要特征的寺洼文化的地方类型遗存，被称作九站类型。由于九站类型遗存从早到晚都含有典型的周文化因素，可以肯定二者的并列关系，这同时也否定了寺洼文化作为先周文化来源的可能性^⑨。1984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合作对临夏莲花台、永靖马路塬遗址的发掘^⑩，证实了辛店文化甲组遗存（姬家川类型）早于乙组遗存（张家咀类型），并在研究中提出了唐汪式陶器的归属及辛店文化渊源探索等问题^⑪。1985 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与甘肃、青海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甘肃广河齐家坪、青海民和核桃庄、民和山家头、大通上孙家寨、循化阿哈特拉山、循化苏志、循化苏呼撒等地点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及大通黄家寨遗址的发掘^⑫，第一次提出了河湟青铜文化谱系的概念并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诸青铜文化类型同时并存发展的对子结构体系^⑬。1985、1986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宁夏两省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甘肃庆阳南佐疙瘩渠遗址、宁夏隆德页河子遗址的发掘^⑭，探讨了仰韶文化之后、齐家文化之前这一时期存在于甘肃东部的被称为常山下层类型遗存的文化面貌及其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关系^⑮。1986、1987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合作对河西走廊的史前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并对酒泉干骨崖遗址进行了发掘^⑯，据此对四坝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四坝文化（含火烧沟类型遗存）与马厂类型遗存、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关系的新论点^⑰。1987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民和阳山墓地发掘材料的整理研究，探讨了半山类型遗存和马厂类型遗存间的演变关系，提出了区分半山类型遗存的几个不同地方性变体的新认识^⑱。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重要的专题研究成果。严文明的《甘肃彩陶源流》一文^⑲，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西北地区各时期彩陶风格的形成、演变及发展过程，提出了彩陶西渐说的观点。俞伟超的《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一文^⑳，首次从经济形态的分析入手，论证了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化的过程，探讨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及世界各地古代社会中的存在事实和意义。张忠培的《齐家文化研究》一文^㉑，从多方面探讨了齐家文化的有关问题，指出齐家文化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制铜技术经历了从红铜向青铜发展的全过程的考古学文化，首次将齐家文化与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作了明确区分，对齐家文化的渊源作了新的探索。

以上只是对一些研究成果作个摘要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但从这简略的回顾中，仍可看出新时期西北史前研究的成就。随着文物普查工作在西北地区全面铺开，新发现的大量史前遗址，必将会给西北史前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课题。

首先，仍然是建立和完善各地的文化发展序列和年代序列。在甘肃东部，早期新石器

时代遗址的寻找和确认,还需花很大的力气去探索。渭河上游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从其发展水平看,还不是最原始的形态,因此,要在渭河上游地区对于年代更早的文化遗存做更多的调查工作,同时,应着重于考察接受中原地区早期文化影响的可能性。在这一地区,还应注意对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关系的探索,对常山下层类型遗存与齐家文化关系的探索,对寺洼文化去向问题的探索,对先周文化、先秦文化的继续探索。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地区,仍需填补文化发展序列上的空白,尤其是对齐家文化的去向,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的来源,马厂类型遗存与齐家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在甘肃西部,要继续探索马厂类型遗存、齐家文化的去向及四坝文化的去向等问题。在新疆东部地区,要逐步建立文化发展序列、年代序列,要着重考察当地文化与甘肃中西部文化、新疆南部与北部文化、中亚地区文化、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宁夏、甘肃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西部地区,要着重于搞清细石器遗存的性质、年代及发展去向等问题,探讨黄河流域文化与草原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建立和完善年代发展序列的同时,要全面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着重于以下几方面课题的探讨:

1.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曾经广泛存在有发达的彩陶文化传统,而且表现出一些相似的特点。中国北方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在青铜时代都曾经大量发现骑马民族的文化遗存,其文化分布往往有大面积的接触地带。因此,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探索,将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对原有观点的简单批判,必须用大量的考古材料作详细的对比分析和论证。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不能因为今天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限制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将有赖于新疆境内的史前研究工作的发现和突破。

2. 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产生的背景及其相互作用问题。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多样,在史前时期,既产生过发达的锄耕农业经济文化,也出现了典型的畜牧经济文化。这种多源经济形态的共存及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我国其他地区尚不多见。因此,这里是探讨社会经济作用的关键性区域。这种作用对后来这一地区多民族聚集格局的形成有决定意义,所以又是探讨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前景将十分诱人。

3. 环境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作用问题。西北地区环境的多样性,表现在考古发现上是文化的多样性。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作用在这里表现的最为直接和显而易见。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方法,对于环境作用进行准确的定性定量分析,并和考古发现作细致的对比分析,将揭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必须给以足够注意的新课题。

4. 文化发展形态的模式研究。着重探讨西北地区这种小规模独立发展的文化群体与

中原地区大范围分布的中心文化所经历的发展道路的不同。这最终或许可以说明，文化的多线进化理论，同文化的多源发生理论一样，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这种小规模独立存在，多种文化群体并行发展的模式的建立，对研究我国边远地区史前时期多种文化的发生、发展形态，无疑将是一种很好的参照系，应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正处在一个发现和资料积累迅速增长的大发展时期。但正如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目前的研究手段、方法、理论建设、人员素质等方面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大发展的需要，因此，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研究工作的黄金时代。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更加感到任重而道远。

西北地区的史前研究，曾经走在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前列，但随着全国各地新发现的不断涌现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形势和西北史前考古研究应有的地位，将激励我们不断地拿出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作出贡献。

1988年5月20日初稿
1989年3月20日定稿于
北大东门外沟沿3号民居

注释

- ① P.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C. C. Young, On Some Neolithic (and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West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XII, No. 1, pp. 92—94. Fig. 12—13. 1932. 转引自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第146页，注①，《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 ②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1925年，乐森筠译。
- ③④ 谢骏义等：《甘肃庆阳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15卷3期。
- ⑤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2期。
- ⑥ 谢骏义：《甘肃镇原黑土梁发现的晚期旧石器》，《考古》1983年2期。
- ⑦ 夏鼐、吴良才：《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考古学报》5册，1951年。
- ⑧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 ⑨ Mengchin, Weltgeschichte der Steinzeit(1931)P. 81, 转引自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
- ⑩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考古学报》3册，1948年。
- ⑪ 转引自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
- ⑫ 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油印本。
- ⑬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
- ⑭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⑮ 甘肃省文管会：《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9期。
- ⑯⑰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连城发掘队：《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文物》1976年3期。
- ⑱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2期。
- ⑲ 任步云：《甘肃泰安县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考古》1958年5期。
- ⑳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
- 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

- ㉚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 ㉛ 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5期。
- 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县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2期。
- ㉝ 安志敏:《略论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的陶器》,《考古学报》1957年2期。
- ㉞ 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3期。
- ㉟ ㉙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2期。
- ㉚ 青海省文管会等:《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1期。
- ㉛ 汪宇平:《水洞沟村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2年11期。
- ㉜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6期。
- ㉝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2期。
- ㉞ 资料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未发表。
- ㉣ 张学正等:《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
- ㉕ 甘肃省文物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2期。
- ㉖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3期。
- 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 ㉘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6期。
- ㉙ ㉚ 《我省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青海日报》1978年2月18日。
- ㉛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1984年。
- ㉜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 ㉞ 资料存甘肃省文物考古所,未发表。
- ㉣ 资料存甘肃省文物考古所,未发表。
- ㉕ 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 ㉖ 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
- ㉗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4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年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11期;《大地湾遗址F901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3期。
- ㉘ 青海省文管会:《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 ㉙ ㉚ ㉛ 许新国、格桑本:《青海省三十年以来的文物考古工作》,《青海考古学会会刊》6期,1984年10月。
- ㉕ 柳春城:《循化县东风公社苏呼撒墓葬发掘简讯》,《青海考古学会会刊》4期,1982年12月。
- ㉖ 青海省文物队:《青海贵德山坪台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7年2期。
- ㉗ 许新国、格桑本:《卡约文化阿哈特拉类型初探》,《青海考古学会会刊》3期,1981年12月。
- ㉘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1期。
- ㉙ 钱伯泉、王炳华:《通俗新疆史》pp.10—12,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 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3期。
- 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4期。
- ㉜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考古》1984年1期;《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群的新发现》,《考古》1988年6期。
- ㉞ 材料未发表。
- 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考古》1982年2期。
- 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奇台县半截沟新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81年6期。
- ㉞ 材料未发表,散见于《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
- ㉞ 材料未发表。
- ㉟ 王明哲、张玉忠:《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墓葬发掘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1期。
- ㉚ 鱼儿沟材料未发表。另见《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 ㉜ 张玉忠:《天山阿拉沟考古考察与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3期。
- ㉙ 吕恩国:《新疆和硕县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5期。

- ⑩ 新疆考古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四号墓地 1986 年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7 年 1 期; 孙秉根、陈戈《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 年 1 期。
- ⑪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 年 2 期。
- ⑫ 水涛:《新疆诸种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待刊稿。
- ⑬ 王炳华:《新疆呼图壁县生殖崇拜岩画的研究》,《新疆文物》1988 年 1 期。
- ⑭ 材料未发表。
- ⑮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 9 期。
- ⑯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 年 3 期。
- ⑰ 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⑱ 材料未发表。
- ⑲ 王占奎:《论九站寺洼文化遗址——兼论甘肃东部地区寺洼文化》,待刊稿。
- ⑳ 马路塬材料未发表。另见《甘肃临夏莲花台辛店文化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88 年 3 期。
- ㉑ 南玉泉:《辛店文化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㉒ 材料未发表。
- ㉓ 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见本文集。
- ㉔ 材料未发表。
- ㉕ 王辉:《试论页河子和疙瘩渠遗址的陶器分期及相关诸问题》,待刊稿。
- ㉖ 材料未发表。
- ㉗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见本文集。
- ㉘ 张弛:《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待刊稿。
- ㉙ 严文明:《甘肃彩陶渊流》,《文物》1978 年 10 期。
- ㉚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
- ㉛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 年 1—2 期。

雁儿湾和西坡坬

严文明 张万仓

1963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59级部分同学由严文明指导在甘肃省兰州地区实习，在甘肃省博物馆及所属文物工作队（现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合作与大力支持下，先后整理了兰州雁儿湾、西坡坬、白道沟坪和武威皇娘娘台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资料，调查了兰州陆家沟、小坪子、西果园和青岗岔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对青岗岔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雁儿湾和西坡坬、白道沟坪、皇娘娘台三个整理报告和青岗岔发掘报告，以后者为基础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①。雁儿湾和西坡坬的资料因文化性质相近，当时都由张万仓整理并写出实习报告。鉴于这份资料对马家窑文化期的特征和分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商得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意，由严文明重新整理撰文予以发表。

雁儿湾

雁儿湾位于兰州市旧城以东约10公里的桑园子乡，遗址北临黄河，高出河面约80米，北部已被河水冲毁。1955年修筑天兰铁路时首先发现了这个遗址，甘肃省文管会随即派人进行了清理，其简况也已发表^②。

由于遗址是在铁路施工中发现并进行清理的，大部分地层已经破坏，仅重点清理了一个灰坑，编号为55LSH1。该坑为不规则椭圆形，北部稍大，口径最长为2.9米，最宽1.6米，底部不平，最深1.9米。坑内堆满灰土、木炭末、黄土块和大量陶片，兼含少量石器、骨器和兽骨等。

石器有磨制和打制两种。磨制石器有锛、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环等。打制石器又分两种：一种是普通打制石器，有两侧带缺口的石刀、网坠和石球等，后者打后全身琢成；另一种是细石器，仅发现6件石叶，另有44件打下的废石片。

骨器有锥、针、指环和穿孔珠饰。

陶质工具有两侧带缺口的陶刀，装饰品则有81件残陶环。